

边缘性与组织化： 高职院校教材建设的基本立场与管理策略

臧志军

(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的出台,对高职院校教材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职院校一方面需要服从国家战略,另一方面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教材建设必然需要达成规范性与地域性的双统一。高职教材具有边缘性特点,高职院校教材建设一方面要尊重这一特性,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组织化策略,以保证教材建设的质量。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材;教材建设;教材管理;边缘性;组织性

中图分类号:G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0)0008-0020-05

国家教材委员会在教材管理中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采取了分类管理的策略。《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指出,职业院校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教材管理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在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可根据本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实际需要,补充编写反映自身专业特色的教材。这一要求向高职院校提出了开展自身教材建设的使命。

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教材关键是体现“新”“实”,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时编修,提升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同时解决“多而少优”的问题。在国家统一进行教材建设规划、大力开发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平衡国家战略要求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行业产业的整体要求与地方行业产业特色需要成为教材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边缘性”这一概念。大众话语中,“边缘性”往往代表着不在中心、被人忽视之类的感觉,但在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中,边缘性却经常是一个积极的、肯定的形容词,本文用边缘性来标示高职院校教材的实然特征。基于此,厘清高职教育教材的基本特性,并探索高职院校教材建设与管理的组织化策略。

一、一致性、边缘性与场域性:高职院校教材建设与管理的分析框架

说到教材,大量研究都在探讨“教材是什么”“教材教什么”“谁来开发教材”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要统一管理教材。”美国人格雷汉姆·唐认为:教科书确立

收稿日期:2020-02-2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与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BJA190090,主持人:臧志军)

作者简介:臧志军(1972—),男,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了课程的框架,而且通常是确立了大部分科目中的一些必修的知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书籍,也是他们第一次并且是他们唯一的阅读机会。^[1]这种理解说明了教材的统一管理对于课程一致性的作用。为了让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相对一致的课程,教材成为必要的知识载体。在由普通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组成的谱系中,对课程一致性的要求是逐级降低的。与普通教育特别追求一致性不同,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行业性特点,其教材也必须包含大量的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地方性知识”,很难做到统一管理。

这就解释了《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做出的如下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课程教材和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专业课程教材在政府规划和引导下,注重发挥行业企业、教科科研机构和学校的作用,更好地对接产业发展。公共课程的一致性要求高,所以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专业课程的一致性要求低,所以政府只需“规划和引导”。

如果把国家对不同类型教育教材的管理看作一个权力圈,普通教育显然处于这个权力圈的核心地位,中职教育处于中间,高职教育就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了。其实,从课程一致性的角度看,高职教育教材管理应该处于这个权力圈最边缘的位置,因为高职教育直接面向就业市场,所细分出的专业是最多的,课程也应该是最繁杂的。

由于高职院校教材管理处于国家教材权力圈边缘,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就具有了更多的“地方性”特点。职业教育对“地方性”有三层理解:一是地域性,职业教育总是与某一特定地域的就业市场紧密相关,二是行业性,职业教育总是发生在特定的行业中,三是个体性,每个人对于知识与技能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高职院校教材的建设与管理总是发生在与社区、行业与个人的互动之中。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高职院校有一个

教材开发、选择、使用的“教材场”。

在“一致性—边缘性—场域性”的论述中,高职院校教材管理的边缘性处于重要地位,它表征了高职教材与普通教育、中职教育之间的不同,也规约了高职院校教材场的形成与发展。

二、边缘性:高职院校教材建设的基本立场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要求职业教育教材“提升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这显然是针对职教教材的一个长期病灶:高职院校的教材是本科教材的压缩饼干。所谓“压缩饼干”,大概是指高职教材延续了本科教材理论性强的特点,把一些教学内容简化后直接呈现给高职院校师生使用。《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原则性要求的本质是把职业教育教材当作另一种类型的教材来建设。

实际上,高职院校也在使用这一原则指导自己的实践,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类型化教材的编写思路大致是用实践导向的思路、用项目化的编写体例来组织教材编写,所以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项目化、行为导向、工作过程导向的高职教材。但人们随之发现,这些教材逐渐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把原来的理论化的教材包装成过程导向的教材,充其量是把“章”“节”改成了“项目”“模块”;二是把高职院校教材改造成了培训用书和操作手册,实用性有了,但学术性没了。

为什么高职院校教材建设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旧问题,却又带来了一堆新问题?可以从边缘性的角度做出解释。

(一)高职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特征

分析高职教育的知识与技能具有边缘性,并不是说这些知识与技能不重要。陈元晖认为,教材编写中的两种基本教育思想,一种是唯理论,一种是经验论,前者以康德、赫尔巴特为代表,以传授“普遍知识”为主,后者以杜威为代表,以传授经验知识为主^[2]。在传统的理解中,普遍知识居于知识体系的核心地位,经验知识往往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尽管职业教育一直在批判这样的理论,但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观点,一时难以改变。

我们所说的高职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还不止于此。舍勒区分了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实证

知识和技术知识等多种知识,^[3]在这个框架中,高职教育所重视的技术知识显然处于边缘地位。更重要的是,高职教育所教的技术知识甚至在整个技术知识体系中也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相对技术知识的生产,高职教育更重视技术知识的应用,在一般公众的理解中,这就是一些边缘性知识。从生产角度来看,高职院校所教的知识与技能却显得理论性较强,与生产的核心任务、核心要求相距较远,也是处于边缘地位。也就是说:高职教育的知识与技能处于“双重边缘性”的地位。

承认了高职教育中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也就可以理解当下许多教材的错漏之处:这些教材总在经意不经意地向学校和企业的核心知识靠拢,部分教材仍试图加强理论阐述,部分教材则试图完全复制企业生产知识。这些努力与高职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背道而驰,自然难以成功。

由于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高职教材的建设既不能照抄本科教材,也不能复制企业知识,应该以打造学校知识、企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中间的“界面”为基本目标。西蒙认为“界面”是一个汇合点,^[4]“它不同于‘表面’,是多个‘面’组成的,有多元参与方;也不同于‘跨界’,是一个可观察、可评估的实体。把教材作为界面,就是要平衡学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企业的特殊知识与一般知识、社会的公共知识与个人的个体知识,使教材成为各种边缘性知识的集合。困境在于国家推出了‘规划教材’的举措,而这些外生于高职院校的教材无法在‘教材场’中体现上述平衡。这就需要我们对‘教材’二字进行重新定义,即高职院校要对规划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形成一系列符合地方性、行业性特点的配套的活页、指导手册、数字资源等,以适应边缘性要求。

(二)高职教材编写者本身的边缘性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实行单位编写制,教材编写人员需要政治立场坚定,对本学科专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丰富的教学、教科研或企业工作经验,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对教材编写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改变教材编写者边缘性的特点。这里所谓的边缘性,也不是认为编写者在所在机构

中是“边缘化”的人物、是不受重视的人。而是说他们应该是“非典型”的编写者。

传统认知中,某一方面的专家、教学能手才可以编写教材。在我国曾经全国一盘棋调动知名专家大兵团作战编写教材,西方国家则鼓励顶尖科学家编写教材,这些都是源于这一思路。但这种编写思路对核心知识有效,对边缘性知识却不一定有效。高职院校的教材编写者不一定是理论或技术方面的顶尖专家,但应该是既了解高职教育需求、也了解社会需求、更了解产业需求的“边缘性”专家。应该期待各种知识在这些专家身上发生聚合作用,而不是让一个外在于企业生产过程的教育专家或一个外在于学校教学过程的企业专家决定哪些知识与技能重要以及这些知识如何教、如何学。

但在实践中,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却是背离这一原则的。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路径依赖,人们对教材仍然有理论偏好;另一方面是由高职院校在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型过程中的茫然与无所适从造成的。对此,要让教材成为学习经验与生产经验的平衡物,就要让教材编写者成为学习经验与生产经验的平衡主体。这就要求学校有意识地培养与打造这样一支教材编写者队伍,这支队伍应该由资深教师、一线教师、企业中的一线管理与技术人员、企业中的培训人员等不同成员组成。否则,在教材建设需求出现时,学校只能依赖传统的教材开发者,仍会跌入教材开发的困境。

(三)教材使用过程的边缘性

在教材的使用上原本就存在“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两种路线之争。^[5]在多年的课程改革之后,特别是许多课程项目化之后,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突出了。传统理论倾向的教材在使用中普遍出现了“教教材”的现象,即老师照本宣科,把教材内容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一遍。许多人提出,教材只是知识的载体,教师不应局限于就教材讲教材,应该通过教材来教。

但课程改革所引发的教材改革并未转向这个方向。通过课程改革,许多教材实现了项目化,甚至出现了像凯洛夫教育学要求的流程化教材,在“教教材”与“用教材教”两种路线中显然是重回前

者:教材中设置好了项目任务与操作流程,使用者按照教材要求一步步实施即可。问题在于各地、各行业、各学校、各教师情况各异,教材中所设项目任务往往不适用,需要教师对教材中项目进行改造。但项目的情境性特点使得改造后的项目与教材中的项目大相径庭。结果造成了部分学校放弃新开发教材、回归传统教材的局面。

这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教材的使用问题。莱夫和温格通过分析学徒制,提出情境化学习是一种“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所谓的“合法”是指学徒对工作的参与是符合规范的,所谓“边缘性参与”是指学徒对工作的参与是“不充分”“非核心”的。^[6]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对教材的使用。首先,由于高职教育的知识与技能的边缘性,没有任何一本教材能够适用于全国所有的高职院校,这决定了高职教师对教材的使用也是边缘性的,教师无需教教材里所呈现的所有知识,可以选择与自己设计的教学项目有关的知识,这就是对教材知识的边缘性应用。从学习者的角度看,根据教学项目选择、重组教材知识的边缘性使用方式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当下有用的知识。其次,高职院校的教学也需要参与到企业、社区的活动中,这个参与可以是在实际物理空间的体验,也可以是在虚拟情境中的感同身受。当然,无论哪种方式,师生都无法进入企业或社区的核心问题领域,而只能是边缘性参与。

从高职院校教材使用是一种边缘性参与的立场出发,可以发现,高职院校促进边缘性参与的机制是不健全的。首先,对教师创造性使用教材缺乏机制性激励,所以,仅有少部分教师乐于做这个工作;其次,教师个体运用学校或非学校资源的能力有限,让学生边缘性参与企业与社会活动并不现实。因此,高职院校应改革教材使用的评价方式,变面向知识的评价为面向教学活动的的评价,变课堂内的评价为整个教育场域的评价,变以教师个体为单位的评价为以教师团队为单位的评价,从而激励教师开展教材的边缘性使用,推动学生边缘性参与企业和社区活动。

三、组织化:高职院校教材管理的基本策略

既然高职院校教材具有边缘性,教材建设具

有场域性。而“边缘性”意味着多元化、多样性、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7]场域也必然是多元主体、多元需求、多元行为与多元结果构成的场域。因此,如何协调多方关系就成了高职院校教材管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教材管理面临的问题

1. 高职院校对教材编写者的管理较为松散

对教材编写者的管理几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阿普尔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词——混合式教材,他说:在美国,教材往往由一个有声望的教授冠名,但实际上是由专业作者甚至是在校研究生编写。^[8]在中国高职院校中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单位编写制,编写单位负责组织编写团队。但在单位责任落实时,由于高职院校中“有声望的教授”还比较稀缺,往往还是由编写者个人负责,主编负责制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主编包干制。而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主编又会落入混合式教材的陷阱。单位所能起到的作用往往只是事后评估,由于专业细分程度、人力资源调配等问题而无法做到事前的督导、事中的监督。

2. 高职院校教材规划,选用程序、规则有待明晰

《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国家、省(区、市)两级规划制度。但高职院校的课程繁多,一些小众课程的教材规范必然要由高职院校实际操作。不利的情况是,越是小众的专业与课程,教材的规划能力越弱,高职院校往往只能勉为其难,或干脆放任无规划的情况发生。按照《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和《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高职院校要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以组织选择国家和省规划教材。但同样由于学校的条件所限,选教材与用教材的可能是同一批教师,即“内部人”,如何保证委员会的公平与中立也是一个难题。

(二)教材管理难题的解决策略:组织化

根据高职院校教材边缘性,教材建设场域性的特点,我们认为,能够让多元主体同唱一个调、同做一件事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化,以有形的组织把不同的主体吸纳进来,形成实体化运作,形成合力,解决教材管理的难题。

1. 改变教材编写者单打独斗的现状,形成开发团队

现实中,高职院校并不缺少类似的教材编写团队,甚至多到了泛滥的程度,但教师的原子化状态并未得到很大改观。

为此,应大力建设教研室。教研室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教育经验,王焕勋指出教研室是进行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的基本组织。^[9]根据当时的制度设计,教研室是教师管理的基本单元,不仅管教学与科研,也管理教师、教材编写、对外联络、教学资源等,其功能的复杂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比现在高职院校中流行的专业带头人制度、名师工作室等要高。教研室制度在高职院校并未完全消亡,需要做的工作只是按照新时代的要求让教研室重新焕发生机。教研室的主要功能仍然保持不变,但在人员构成、功能展开等方面需要融入全新的思路,如教研室需要引入对教育活动感兴趣的企业人员、社会人士,教研室需要把教学科研从传统课堂搬到产教结合的场域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就有可能形成一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材开发、使用的新团队。

2. 改变“内部人”规划与选用教材的现状

在管理学上,认为股权分散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解决方案一般是要求企业所有者的回归。^[10]在高职院校的教材管理中不存在股权问题,但存在参与管理者过少、管理业务过于专业而导致的

管理困境。因此,建议高职院校加强教材规划与选用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一方面引入更多同行专家、对教育感兴趣的企业人士、社会人士参与;另一方面赋予委员会实际权力,推动委员会持续、稳定地运作,树立起委员会的权威性,断绝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8](美)阿普尔,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5-6,38.
- [2]陈元晖.中国教育七十年(中)[J].北京师范大学学院(社会科学),1991(5):52-56.
- [3](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7.
- [4]李文钊.理解中国城市治理:一个界面治理理论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9(9):74.
- [5]Apple. Regulating the Text: The Social-historical Roots[J].Educational Policy, 1989, 3(6):107-123.
- [6][7]莱夫和温格.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8-10.
- [9]王焕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是如何进行工作的[J].人民教育,1954(6):13.
- [10]纪建悦,等.内部人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得分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8-40.

欢迎订阅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全国职教核心期刊

本刊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本刊为旬刊,每月综合、教学、理论交替出版;每期定价12.00元,全年定价432.00元;邮发代号82-866。本刊编辑部可提供更为灵活的订阅方式,包括全年、破期、专版、加印、零订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16层 邮编:100029 电话:(010)58556724